

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艾希 劉丹漫

[摘要] 19世紀中後期，隨着南洋局勢日益緊張，海南內憂外患的處境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和討論，而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的當屬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鄭觀應立足於海南內外部要素的系統分析，在軍事方面，系統闡述兵力、硬件設施、情報體系的軍事力量部署；在人文方面，主張綜合自治、基建、經濟、開民等措施穩定內部環境；在經濟方面，提出借助農林礦產資源的開發打造海南貿易圈。同時期的張之洞海南經略也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成果，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後得出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存在共通之處，也存在價值和理念差異。二者都主張海南軍事進行現代化建設，重視內部穩定和黎族發展，鼓勵加快海南資源開發刺激經濟。但民本意識的體現程度不同，“治黎”、“撫黎”舉措的側重點不同，一體化、區域化思維的本土化應用程度不同。鄭觀應海南經略的科學性、超前性更為顯著。

[關鍵詞] 治黎 海南 海防部署 張之洞 經濟建設 鄭觀應

19世紀以來，基於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海南問題成為了思想界的討論焦點，其中鄭觀應、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為海南近代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關於鄭觀應海南經略的價值考究，夏東元教授高度評價了鄭觀應的“萬國商場”思想，直言鄭觀應的眼光和膽識都遠在凡人之上，該思想是同時代任何一位思想家都不能企及的。^①邵建教授則認為鄭觀應將海南問題上升到了國家的戰略層面，並根據自己對海南進行的考察分析，對經濟、軍事、少數民族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設想和經略，具有很好的時代意義。^②而同一時代背景下的張之洞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海南經略，並在很大程度上落實了相關舉措，為海南近代發展繪上極具價值的一筆，與鄭觀應的海南經略有較大的比較研究價值。目前在現有的比較研究中，陳曉平在〈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一文中有章節提到開發海南，但著墨不多，缺乏較為深入的同維度比較，也沒有明確兩者海南經略的異同之處。^③與張之洞海南經略相比，鄭觀應在重塑海南海防體系與其有何優良之處？鄭觀應的“懷柔治黎”

作者簡介：艾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廣東第二師範學院講師；劉丹漫，廣東第二師範學院政法系本科生。廣州 510310

^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11期（1992）。

^②邵建：〈鄭觀應開發開放海南島思想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2012紀念鄭觀應先生誕辰一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2012年。

^③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年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的理念進步點體現在哪裏？鄭觀應對挖掘激發海南經濟商機有何獨特的見解？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究竟有哪些異同？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從軍事、人文、經濟三個方面切入，對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海南經略進行多維度比較，有利於明晰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價值和理念差異，完善鄭觀應和張之洞的思想體系研究，增加近代海南經略的可探究性、科學性、系統性。

一、海防經略打破傳統地緣政治觀

隨着民族的海洋意識逐漸覺醒，海防思想在兩次鴉片戰爭後不斷發展。法國作為海權國家，中國作為陸權國家，而海南正處於海陸權的地緣政治區域的暴風眼。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更多在於監控地方勢力，也較少關注海洋的全球視域。^①鄭觀應在張之洞授命下進行南遊考察，為張之洞提供了許多關於海南和南海的情報信息，兩者的海南經略均卸下了中國傳統地緣政治觀的部分枷鎖。

（一）海南的地緣政治地位明確

在法國佔領了西貢及繼與越南開戰後，鄭觀應充分認識到法國對我國的海南地區的野心，直言“法人自咸豐九年奪取西貢，設大帥鎮撫其區，經之營之，二十年來無少間日，陽與鄰邦和好，陰懷兼併之心”，^②可見西貢成為了法國開拓東南亞殖民地、進犯中國的重要據點。

海南，是我們中國在南洋地區的孤島，海域面積較大，與內陸地區的聯繫並不密切。然而，海南作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更是對我國南部海防、廣東的安全都有重要的影響，是“咽喉門戶”，正如鄭觀應所言“夫華洋交界之處，實為中外關鍵，海口扼據得勢，陸路縱有疏略，無損大局。南洋內蔽各省，外控諸番，誠中國之屏藩、廣東之咽喉門戶也……竊海防形勢首重南洋，其次莫如瓊郡”。^③由此可知，若海南被攻佔，那麼中國的海防將會更加被動，而廣東也將會岌岌可危。

海南距離內陸較遠，又有水域阻隔，消息傳達不暢，在邊防的部署中，清政府並沒有過多的精力去顧及海南。然而，法軍已經佔領了西貢，隨後又對越南開戰，而海南因為沒有了強大實力的支持和庇護，如若再不進行改革和相關的戰略部署，那麼它也將會步台灣的后塵。所以，在海防的戰略部署中，鄭觀應認為海南是南方海防的重要一環，並多次向清政府強調要予以海南抵禦列強進犯的高度重視。

對於海南戰略地位的認識，張之洞指出“是瓊島一隅，在中國則如石田、如贅瘤，然令他人據之，則全粵不能一日安枕，非唯一國之覬覦，實為列邦所屬目”。^④他還進一步

^①安北江：〈中國古代的政治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戰線》（昆明），第6期（2021），頁76—88。

^②[清]鄭觀應：〈《南遊日記》自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29。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62。

^④趙德馨編：《張之洞全集》第一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頁522。

表明“海南一旦落入敵手，則中國東南沿海，將全為敵人所控制”。^①由此可看出，張之洞和鄭觀應對海南戰略地位的認識基本一致，兩者均充分意識到海南對廣東、乃至整個東南沿海的戰略影響。

（二）海南的近代軍事體系凸顯

在海南軍事體系的建設中，張之洞和鄭觀應都有了充分的近代軍事思想意識。軍事近代主要體現有：不排斥地方力量的正規化、軍事防禦體系已不拘於硬件因素、對外的夥伴關係的合作敏感性有新的認知。

（1）正規化利用地方力量

針對清軍抗敵積極性低、兵力不足的情況，鄭觀應在〈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中明確指出“用其子弟自守家鄉，自應較外來兵勇尤為得力也”。^②他認為，組織訓練海南的民兵團可以彌補清政府兵力的不足，而且子弟兵保衛自己家鄉積極性較高，既有熟悉當地地理氣候的優勢，也能夠拿出保衛家鄉百分的熱情和忠誠，可以成為海南佈防的主力軍之一。這與張之洞實行的訓練綠營兵、組建地方武裝——鄉勇、組建新軍三個措施有着相同的基本理念。相比於傳統中央集權思想對地方軍事武裝的極力打擊，鄭觀應能夠意識到群眾的力量和民兵團成立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維方式。

（2）重視信息戰略地位

在海南軍事硬體設施方面，鄭觀應認為必須“瓊台、長沙門等處先行擇險設防，仍留意南洋門戶，險要處築炮台派鐵甲魚雷快艇扼守，以顧完全”；^③對於火炮、軍艦的配備，鄭觀應清楚意識到中國在與列強的對抗中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火器比不上敵人。所以鄭觀應認為“制勝以炮械為先”、“中外失和，不論何等軍器均不能售也”，^④自主製造生產火器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取得戰爭主動權、提高國家實力的重要舉措。

為抵禦法軍的進犯，鄭觀應在《南遊日記》的五月十六日的日記中闡述了八個方面的預防舉措。除了火器的籌備和校準，籌備必備的軍需糧草，鼓勵軍民一同抗戰外，鄭觀應也提到要防止教民趁機作亂，與商民產生更大的衝突，重視商業電報洩露軍情的情況等等。此外還特地指出要避免步越南的後塵，重視內部的團結，嚴抓通外敵刺探情報的內奸，盡力避免“脅中國之人以攻中國，藉中國之糧以困中國”。^⑤

隨着通訊設備的不斷發展，相應的信息體系也必須隨着更新改革；沒有成熟的情報體

^①蘇雲峰：《海南歷史論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頁89。

^②[清]鄭觀應：〈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64。

^③[清]鄭觀應：〈稟督辦海防彭宮保、兩廣督憲張振帥論海防〉，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36。

^④[清]鄭觀應：〈上督辦粵防彭宮保並寄方、鄭兩軍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563。

^⑤[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50—252。

系和獨立的通訊網絡，在戰爭中可能會因為信息的滯後和洩漏而處於被動並導致最終的失敗。鄭觀應、張之洞對通訊情報體系的建設有充分的認識。鄭觀應對信息體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融合了發展性思維，而張之洞在海南架設的電線形成的電報網對海南的現代化建設具有極大的促進價值。張之洞在〈展設欽廉雷瓊電線片〉中對海南的電線線路作出了詳細的規劃：“自橫州舊線南出一歧作線，經靈山、合浦達廉州府城，南抵北海，計線路三百四十四里。”^①可見，鄭觀應在海南海防建設經略中，能夠關注到情報和通訊體系自主權掌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順應了時代的發展。

(3) 關注中泰夥伴關係

在清楚認知中法軍事實力差距後，鄭觀應對中泰的夥伴合作關係作了一定的闡述。他認為，泰國作為清政府前附屬國且毗鄰越南，兩者為“唇齒關係”，泰國於公於私都應出兵相助。正如鄭觀應在《南遊日記》中所言“越南已受其愚，須早合從以禦暴。若遲羅猶遲疑瞻顧，不聯緬甸以事中國，將來必蹈越南覆轍，不為英亂，定為法滅”。^②前文提及西貢是法軍在南洋實施戰略侵佔的重要據點，鄭觀應在《南遊日記》五月十六日的日記中直接點出“聞法事又將決裂，藉端要脅。果能如願，當出其不意，毀其老巢，使無駐足也”。^③鄭觀應借泰國的兵主要是為了攻佔西貢，讓法軍失去駐紮的據點，進而緩解海南的艱難處境。

(三) 鄭張海南軍事經略小結

鄭觀應的海南海防建設主要從提高軍隊戰鬥力、改良武器裝備、建構情報體系、尋求外軍支援等方面進行規劃，具備了軍事體系建設的思想雛形；而張之洞加強海南海防建設的措施則是真正為海南的海防開啟了近代化的進程。張之洞利用近代軍事技術手段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有派遣官員測量並繪製瓊防圖、鋪設電報電線、增修建置海南各處炮台、建設榆林軍港等。其中張之洞對榆林軍港的開埠是崖州現代海防之始。^④相較而言，鄭觀應對於海南海防經略中，與張之洞在電報電線的鋪設、炮台的修建上以及利用海南當地有效武裝達成的共識，是其經略科學性的體現。必須指出的是，鄭觀應提出向泰國借兵的建議，雖然有一定的現實必要性，但也暴露出了鄭觀應對外國支援力量的幻想。但是鄭觀應以區域聯繫的觀點分析海南在南海中的戰略地位，充分抓住中泰雙方禦法衛瓊的共同利益點，該區域化的規劃思維具有一定的思想突破性。

二、懷柔德化經略以期除黎匪癥結

海南內部的治理歷代多以“黎區”的相關問題為焦點，黎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問題衍生了一系列的“撫黎”措施，所以“撫黎”的相關措施一直是研究各大家海南經略的

^①周偉民、唐玲玲編：《張之洞經略瓊崖史料匯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年。

^②[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8—239。

^③[清]鄭觀應：《南遊日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50—252。

^④何永濤：〈試析張之洞與晚清海南海防事業的發展〉，《西安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3期（2017）。

重點話題。鄭觀應的海南經略的研究也不例外。〈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一文釐清了黎人在海南建設中的地位，其中“然防瓊必以富瓊為要，富瓊當以撫黎為先”，^①更是直接表明了要緩解黎人與瓊民、清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對穩定海南內部社會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中法一旦開戰，這些黎民也就有了作亂的時機，若海南要想全身心地抵禦外來的侵略，勢必要優先解決內患，而其內患主要是當地黎人對清政府的抵觸和積匪的作亂。在論述治黎經略時，鄭觀應主要傾向於以溫和的方式解決黎人自身的矛盾以及面臨的發展問題。有關張之洞方面，馮子材的治黎措施以張氏的治黎經略為核心指導思想，所以結合馮子材的相關思想和舉措探討治黎問題是可行的。

（一）安內和攘外的辯證性認識

在“安內”和“攘外”的問題上，鄭觀應具體分析了內亂的成因以及內亂和外患之間的聯繫。他指出，黎族內部階級分化不斷嚴重，漢族奸商、高利貸的“唆騙盤剝”，以及當地統治者的剝削壓迫，黎族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最終成為了“黎匪”。^②四周被海域包圍，便利的水路以及遠離清政府政治中心等等都使海南成為了匪患藏匿的最佳場所，而列強對海南的覬覦更使得消滅積匪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

黎匪在擾亂海南內部的利益的同時，也極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與法人合作，兩者勾結聯合勢必讓海南陷入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對此鄭觀應直言“撫黎不能不辦積匪，辦積匪即所以撫群黎”。^③在鄭觀應看來，匪患會趁亂挑唆思想開化程度較低的黎人叛亂，統治階級要想穩定海南黎區並保障“治黎”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就必須優先解決匪患問題。而黎人一旦與匪患聯手，“彼據險屯田以為長久計，若不早為剿絕，恐一度嶺煽動，岐黎蟻聚蜂屯，全瓊震動滋蔓，更覺難圖”，^④屆時中法開戰，海南對法軍而言將會不攻自破。

光緒十年十二月中，張之洞在〈截擊瓊州客黎各匪折〉中較為詳細地奏報了“黎亂”及“平黎”的情況，其中就明確指出了“客匪”和“黎匪”。面對客、黎的聯合作亂，他在馮子材的提議下，制定了“先平黎亂再剿客匪”的方針策略；面對內憂外患的海南狀況，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⑤

相比於鄭觀應中，張之洞、馮子材的平黎計劃較為詳細且有針對性，但是他們平黎的最終目的是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地位，在措施中以暴力強行鎮壓，面對外來的侵略則採取消極應對的心態；鄭觀應的平黎主要目的則為盡可能團結海南的各族人民的力量，構築海南

^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1。

^②盧葦：〈清代海南的“黎亂”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廣東社會科學》（廣州），第1期（1993）。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5。

^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5。

^⑤袁國客：〈張之洞治理海南黎族述評〉，《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銀川），第1期（2003）。

的軍事力量以抵抗法軍的進犯。相較之下，鄭觀應在關於如何緩解海南的危機問題的思考上，正確把握了“攘外”和“安內”相輔相成的關係。鄭觀應不僅將取得戰爭的勝利寄希望於軍事佈防和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援，也能聚焦於培養海南內部的新生力量，進而在分析現有的局勢後，以最優化的方案經略解決海南現有的內部憂患。

（二）儒家懷柔德化經略的應用

黎人之所以會成為海南內部不穩定的威脅，鄭觀應提出了兩個主要原因：“其梗頑不變者，一緣於向化之無由，二每為奸人之所隔”。^①此外，鄭觀應將黎人劃分為生黎和熟黎。鄭觀應認為“黎人巢處岩壑，耕田而食，射獵為生，原安樸素，不過生黎為熟黎所誘，熟黎為土豪所欺，遂至勾通叛亂”。^②

對於黎人叛亂，鄭觀應則是對生黎予以懷柔招撫，而對仍有抵抗意識的熟黎，則採取鼓勵包圍手段斷絕其糧草、武器。這與張之洞、馮子材提出的相關方針理念大致相同。他們認為將黎族人民進行區別化對待，能夠傳達“平亂者”實現黎區穩定的意願，或減少阻礙，或得到“生黎”的援助。

黎人生存環境固守自封，文化水平低下，對外界的環境具有很強的敵意，對此鄭觀應提出以文開化黎人，幫助黎人改變原始落後的粗獷生活習慣。鄭觀應直接點出“誠能教之以方，馭之有法，起居飲食以馴其狼心，大義五倫以縛其野性……貪饕成則口腹慣，饑寒迫則耕作勤，習與性成，雖復驅之為黎人不可得矣，又奚用大兵壓境哉”。^③可見，鄭觀應並不支持一切採用武力鎮壓，而試圖以懷柔手段招撫黎人。

（1）承認黎人自治的合法性

以文開化思想，以商業貿易帶動黎人與外界的溝通，即“以黎治黎，以峒辟峒。設通商之市，以有易無；立義學之規，勝殘去殺”。^④鄭觀應主張給予黎人一定的管理自主權，這與傳統的中央集權主義思想相比，具有一定的改革色彩。但是海南遠離政權中心，清政府已經沒有多餘的精力對黎人制定和實施新的管理經略，而黎人經過多年的自我管理已經自成體系。鄭觀應結合分析了中國當時執政階級的窘境和黎區的現狀後，認為應當繼續完善改革黎區自治的政治體系。

對於黎族內部的治理，張之洞與馮子材關於治黎經略思想和措施之目的，與鄭觀應的不盡相同。張之洞與馮子材為鞏固中央政府的統治，致力於變革海南黎區的基層政治體系，改革沿用明朝的黎族土官制。清朝土官制中土官世襲的規定為光緒年間黎族社會出現階層

^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2。

^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4。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2—603。

^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2。

分化埋下了“導火線”，這也是海南黎區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此，張之洞與馮子材開設了撫黎局，張之洞為改變“以黎治黎”的傳統模式，削弱了土官的權力，讓清政府有更多的黎區控制權。同時，當任用有威望之人作為撫黎局總長時，為了保證黎人沒有反抗清政府的機會，要求擔任者必須派親屬到官府當差，實則以其為人質加以制約。^①對於是否“以黎治黎”的問題，張之洞、馮子材的經略主要立足於統治階級的角度，以鞏固清政府的統治為出發點；而鄭觀應提出的“以黎治黎”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思想，順應了歷史的發展趨勢，黎族自治經略與中國現代實施的民族自治區經略更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2) 開通黎峒山川道路

海南黎區的道路開闢對加強黎族與漢族之間的交流、促進黎族的發展發揮的巨大作用，清末及以後的有識之士都清楚意識到了這一點。而將黎區的道路開闢計劃貫徹得最為徹底的當屬張之洞與馮子材。而張之洞的治黎經略得以大部分落實，馮子材可謂先鋒者。關於馮子材的撫黎成就，柳震清直言馮子材與陳漢光並列為數千年來撫黎最為傑出的人物。^②馮子材的“平黎”受命於張之洞，其治黎經略也與他的不差上下，可以說，馮子材是張之洞治黎的“首席執行者”。鄭觀應不支持“開十字路”的原因主要是考慮到黎漢兩族之間的矛盾；他認為黎峒之路工程量較小，耗時較短，動用人力也較少，“況開十字路必須借重兵力，若無故以重兵壓境，黎人勢必驚惶蠢動，抵死以禦我師”，^③即開路反而因工程量過大而進一步激化黎人與清政府的矛盾。而張之洞、馮子材則是貫徹“大舉激辦”的方針，以武力強行鎮壓“黎亂”，在震懾黎人後，在高強度的作業下，竟提前完成了“十字路”的道路工程建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馮子材“開通十字大路”的舉措為黎區的發展帶來了很好的契機，也為民國時期陳漢光進行黎區道路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而鄭觀應主要站在黎人民眾的立場進行對黎區道路進行建設規劃，將促進黎區的穩定放在了首要考慮地位。

(3) 發展海南的資本主義經濟

鄭觀應提倡僱用黎人參與甘蔗的種植和蔗糖生產，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可以此提高黎人和當地人民的經濟收入，讓黎人有利益可謀，並借此弱化其暴亂的動機。這種僱傭生產模式其實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理念的一種體現。

不管是鄭觀應提出以甘蔗的種植和蔗糖的生產，還是張之洞提出僱用黎人開採礦產資源，都是溫和的民生措施。但相較而言，鄭觀應所提出的經濟模式更符合時代的發展趨勢。首先，張之洞對僱傭生產經濟模式只局限於礦產的開採過程，而鄭觀應所提出的農業生產體系則是完全突破了小農經濟思想的局限。其次，鄭觀應能夠正確把握就業對社會穩定的邏輯關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經濟保障社會穩定的核心理念不相上下。而在當時

^①肖紅松：〈張之洞治黎方策和績效論析〉，《歷史教學》（天津），第7期（2005）。

^②王獻軍：〈陳漢光的治黎措施及其評價與再認識〉，《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三亞），第1期（2018）。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1。

的社會背景下，以懷柔為中心思想，在對黎人與漢人之間的矛盾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基礎上，發展經濟是促進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既能夠減少不必要的衝突，也能夠穩定社會秩序，不給列強有可乘之機，不失為增強黎區內部凝聚力的有效手段。

(4) 黎漢通婚和發展黎區教育

清末的黎族人民除了受到帝國主義入侵外，還受到來自清廷、當地貪官污吏以及本民族上層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漢人對黎人的欺騙都是民族矛盾的累積。^①要緩解民族矛盾，穩定黎區，減輕漢族對黎族的敵意，引導黎人走出封閉的生存環境，單靠暴力鎮壓並不能得到徹底實現，鄭觀應指出通婚和發展黎區教育才是優先選擇的良策。

鄭觀應對於提出黎漢通婚的理由是“甥舅往來示無虞詐”。^②“通婚”自古以來就是處理民族關係的重要策略，北魏孝文帝為了促進鮮卑族與漢族更好地融合，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聯姻。民國時期的陳漢光在黎區的治黎計劃中，“開化”計劃明確了改良風俗和黎漢通婚兩項措施。從重視血緣關係的漢文化氛圍角度來看，讓黎人和平融進漢族的生活，可讓他們進行自我改進，實現兩個民族的人民雙向融合，以此加速民族間矛盾的緩和。通婚作為一種和平過渡緩解民族關係的方式，從中可見鄭觀應的懷柔思想。

而關於在黎區開展教育的提議，鄭觀應指出“甚至為敵人前驅，或充作奸細，皆失於教化”，該理念同張之洞的“除弊化俗”理念均重視對黎人的教化。張之洞針對“各黎性固愚獷，亦甚樸魯，平日每為奸民剝削”的狀況，提出興教育以化民俗的主張。^③當然，除了鄭觀應、張之洞的主張，在鴉片戰爭後，民族開化教育都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廣泛認同。而該主張的落實效果則可見於馮子材的“延師設學”舉措。馮子材是落實黎區文化教育措施的“先鋒”，他將文化教育深入落實到了黎區的內部。而民國時期的陳漢光“建立學校”的治黎計劃也是在馮子材的“延師設學”的基礎上加以發展。

(三) 鄭張海南人文經略小結

張之洞提出一系列的“治黎”、“撫黎”思想與措施對海南的近代化發展有着很大的促進作用，而馮子材則是張之洞海南發展思想的首要執行者。儘管柳震清對馮子材給予高度評價，但鄭觀應的促進黎區內部穩定的經略與同時期的張之洞、馮子材相比較為柔和。這主要因為鄭觀應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與張之洞、馮子材不同，鄭觀應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先進民主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提出的治黎經略能夠從黎人利益角度出發，所追求的是黎漢兩族之間的共贏，是黎區的穩定，是充分發揮海南在中國南海的海防屏障作用。

^①王瑤瑤：〈清末馮子材“治黎”“平黎”研究〉，碩士論文，海南師範大學，2020年，頁19。

^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③劉亞玲：〈張之洞開發海南的思想與實踐〉，《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3期（2006）。

三、經濟合作經略以謀求國際地位

商戰思想一直是鄭觀應的核心思想，他認為要抵禦外侮，就必須自強，必須發展近代工商業，甚至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①鄭觀應的海南經略價值更多體現在其經濟經略部分，其海南經略目的主要在兩方面：一是為相關的軍事活動提供資金支持，二是試圖為海南謀求國際地位。

針對“撫黎”經費問題，張之洞、馮子材採取的主要兩個措施有：一是強行督促當地的官紳監督捐納，二是暫時提高對海南和各港口的稅收。但海南自身的經濟發展本就因自然環境而受到很大的局限，再加上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和官紳的剝削，黎區人民早已苦不堪言。^②雖然這兩項措施確實能解燃眉之急，但其實施勢必會引發黎區人民暴動、壓跨海南自身的財政、加劇海南內部矛盾等一系列問題。可見，這兩項措施的實施並不是最優選擇。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那兩項強硬性措施只是將最終的經濟壓力嫁接到當地人民群眾身上，是一種典型的“拆西牆補東牆”的不明智做法，只會更加激化海南的內部矛盾。

反之，鄭觀應提出的關於海南黎區建設費用的經略具有可持續性、可行性。鄭觀應表示，“以鄙見計之，究不如因瓊州之民力以開瓊州之利權，而為撫黎之經費”。^③他對海南的氣候和地理都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結合國內外市場的分析，參考同溫度帶外國的農業模式，對農業、礦產業和畜牧業都提出了系統的創新經略。而他參考美國、新加坡的相關模式提出建設以海南為中心的貿易圈，在小農經濟體制仍沒有得到徹底瓦解，且統治階級還未清晰意識到以開放理念融進國際市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社會背景下，如此宏大的經略凸顯其創時代先河的地位。

（一）產業資源和市場的協同開發

（1）聚焦國內外市場，開拓新農產品資源

海南雖然瘴氣讓人望而生畏，但因為與呂宋、台灣的緯度相近，且荒地較多，土質為“礫質”、“土實塗泥”，所以鄭觀應認為它具有很大的農業發展潛力。經過多番的考察，鄭觀應認為甘蔗、蕉麻和咖啡是最適宜種植的農產品。

對於農業經濟的經略發展，鄭觀應不囿於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而是聚焦市場需求，採取機器大生產的模式，並且構想將海南打造成國際貿易的中心，即踐行“萬國公共商場”的理念。由於清政府衰落的綜合實力，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想要通過平等的外交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已然不現實。海南若想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成功融進世界市場，其經濟發展和產品生產便有必要聚焦於西方市場的需求，方可實現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利益捆綁。

^①夏東元：〈鄭觀應思想發展論〉，《社會科學戰線》（長春），第2期（1979），頁169。

^②唐上意：〈張之洞對瓊州客黎起義的鎮撫與黎區的開發〉，《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3期（1993）。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5。

對於市場需求的分析，鄭觀應在南遊報告中都作了詳細的論述。雖然“瓊地素不產茶”，^①但是鄭觀應認為海南可以種植咖啡代替茶。對兩者的比較，鄭觀應明確指出：“其（咖啡）工較植茶尤易，其利較茶為數倍”，^②鄭觀應在報告中記載道“考外國洋人飲食，咖啡與糖、面為日所必需，雖外洋種植繁滋，仍不足用”，^③咖啡和糖在西方的市場中依然處於不飽和的狀態，正是海南進入世界市場的主要缺口。而海南在咖啡種植方面的優勢在於其具有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和大面積的種植地，以及優越的種植氣候和土壤。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製糖工業，並對製糖工業所述勞動力作了大概的闡述：“用機器榨洋糖之法，每一糖榨大者可用千人，小者或五六百人……夫一糖榨可以用千人，百糖榨可以用十萬人。”^④他認為借助種植甘蔗和發展製糖產業可以為黎人謀求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黎漢兩族之間的矛盾；同時製糖工業的發展會吸引外來商人對海南的投資。咖啡與糖兩種商品具有互補關係，這兩種商品在西方市場中需求彈性小，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可作為海南長期的農業產業支柱。可見，鄭觀應提出的農業體系建構出發點為當地的人民，凸顯其經略的民主性和系統性；尤其是他提出的“甘蔗種植—蔗糖生產”產供銷一體化產業鏈具有極高的可行性和科學性。

而蕉麻則面向清政府的生產需求，鄭觀應對其作用直言道“設造機器結為大小繩纜，以供天下戰艦及招商局輪船之用”。^⑤他指出種植蕉麻不僅可以為輪船招商局輪船和戰艦提供麻繩，還可奪佔呂宋的市場利益，即“以中國之所產奪外國之利權”。^⑥此舉可看出鄭觀應的商戰思想，更是將海南的發展與國家利益直接掛鉤，使統治階級充分意識到海南發展的價值，從而減少海南建設發展的政治阻力。

在選擇海南的農產品種植時，鄭觀應除了對種植環境進行分析外，還充分考慮其收益。農產品的引進和相關產品的生產對海南來說，既能夠穩定社會秩序，也能夠解清政府財政難以支撐海南築防的困境。在報告中，鄭觀應對三大產品的收入預算作了如下的闡述：“約地稅、關稅每年合算，大糖榨可得銀二萬餘元，小者可得銀一萬餘元……更於瓊地之中擇其可種麻者……每年可以多至百萬餘金……至其高旱之地，則種植咖啡……而其工較植茶尤易，其利較茶為數倍。”^⑦為了讓海南的建設得到統治者的支援，鄭觀應用數字直觀地

^①[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7。

^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7。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1。

^⑤[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⑥[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⑦[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607。

展示了海南發展經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鄭觀應對海南新農產品體系的建構具有多樣性、開拓性思維，他設想的工商相結合的產業鏈完全突破了傳統的小農經濟思想。在發展海南農業方面的認識上，張之洞在〈撫黎章程〉中具體指出了“移民墾黎山”和“尋覓咖啡種子在瓊種植，以收外洋之利”兩項措施。^①在海南新農產品的探索認識上，鄭觀應、張之洞在一定程度上都運用了國際市場思維。

不可否認的是，十多年的買辦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鄭觀應拓展自己的視野，並非僅將視野囿於資源的開採環節以及國內的市場，而能提出具備世界市場視野的“生產—銷售”的市場鏈和市場建構體系。當然，由於其自身的政治立場，在進行市場經略構想時，對清政府的利益有所顧忌，鄭觀應提出的經略還是有一定的階級妥協性。

(2) 開發礦產資源，發展畜牧業

在對海南進行地理考察之時，除了對農業有了系統經略，鄭觀應還注意到海南蘊藏的豐富森林礦產資源，但由於瘴氣的阻礙，資源並沒有得到有效開採，這也是法人覬覦海南的原因之一。對此，鄭觀應表示“急宜招商集股，開採須有獎勵引誘之法”。^②他提倡可以對外進行招商引資，借助外國人的資金和技術對海南進行開採。既然列強都想得到海南的資源，還不如我們以經濟的開放發展主動與其分羹。此外，鄭觀應還提出將判了死刑的囚犯作為首批開發勞工，隨後再考慮招募農工進行資源開採。在分析海南礦產資源的開採時，鄭觀應明確指出“採取巨木佳礦出售，非但利國利民，且可免外人攫奪也”。^③面對法軍隨時都可能進犯海南的危機，鄭觀應在報告中更是多次強調清政府應盡快採取招商集資的方式開採海南礦產資源。

招商集資既是實現區域經濟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讓海南的整體經濟經略得以落實的資金獲取管道，所以這樣的做法對國庫已經虧空的清政府來說，不失為減輕財政壓力的解決途徑。再者，礦產資源的開採需要技術支援，況且海南有瘴氣等自然條件的限制，所以招商引資的模式既解決了資金缺乏的難題，也排除了技術水平低的困境。由此可知，引進外資既能帶動內部經濟發展，也是與他國實現利益掛鉤的最直接形式。

在對礦產資源分配問題的思考上，鄭觀應提出“宜歸官者則歸官，宜歸商者則歸商，宜歸民者則歸民”。^④礦產資源的開採主要服務於軍事建設，也為當地人民提供就業、商業機會，是活躍當地經濟的重要方式。鄭觀應將其帶來的利益總結為“則下為利是求，上即因民而利，亦未嘗非富強之一策也”。^⑤該舉措與蕉麻的種植一樣，均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直接

^①唐上意：〈張之洞對瓊州客黎起義的鎮撫與黎區的開發〉，《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第3期（1993）。

^②[清]鄭觀應：〈致雷瓊道王爵棠觀察論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8。

^③[清]鄭觀應：〈致雷瓊道王爵棠觀察論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8。

^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⑤[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6。

掛鉤，這讓海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統治階層更多利益上的關注，進而為海南的發展減少政治阻力，贏得更多的政治力量支持。

清末，海南黎區的礦產、林木資源逐漸受到統治階級的關注，也具有一定的開發規模，但開發進程主要受限於資金和當地的自然環境。在張之洞的“撫黎”措施中，在黎區招商伐木，助商開礦，商人進入黎區後，集資合股，並僱用黎人從事伐木開礦的工作，既開發了黎區的資源，也促進了黎人從業。^①顯然，兩人對海南的礦產、林木資源都有招商集資開採資源的意識，但兩人的區別在於，鄭觀應在提出礦產資源開採時，認為外國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克服海南的瘴氣環境，所以他所主張的外資引進模式趨向於對外開放；而張之洞的外資引進仍立足於國內的市場格局，他傾向於吸引內地的資本家前往海南進行投資開發。

資源的分配往往與階級利益有直接的關聯。雖然鄭觀應不能夠對中國近代社會矛盾有較為清晰的認識，但從其資源的分配經略中，我們可以看出，鄭觀應力求階級之間的利益能夠得到和諧的分配，也側面反映了其資本主義思想中的私有制成分。

除了農業和礦產業，鄭觀應還指出發展海南的畜牧業。他認為“西北所賤，未必不為東南之所珍”，^②“況瓊州地沃草肥，放馬牧牛，倍形茁壯，購牛馬之良種，分授黎人芻牧，或備駕馭，亦可煇皮。而畜類之滋生，在在皆利民之要術”。^③他對於畜牧業發展優點的思考，一是着眼於西方市場對牛羊肉的需求以及南方市場的缺口，二是着眼於借飼養馬匹來連接海南內陸的交通，從而促進商品的流通。

雖然鄭觀應提出的海南畜牧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從實際出發考慮在海南發展畜牧業可行性並不高。首先，海南處於熱帶地區，並不適合牧草的生長；其次，海南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自身購買力不足，而海南與內陸地區又有水域相隔，在海運不便利的情況下，畜牧業所生產的產品並不能夠獲得國內市場的支持；再者，畜牧業的產品多為牛羊肉、乳製品，這些產品與中國自身的飲食習慣並不契合，所以只能將市場轉移到西方的市場，然而西方國家關於此類的產品生產已經擁有高品質、成熟、穩定的體系，基本上不需要外來進口。綜上，鄭觀應對海南的畜牧業經略建設的提議在當時的情景下並不具有可行性。

（二）海南政治認同的空間轉向

在農業、林礦產資源的開發、畜牧業的經略中，鄭觀應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世界市場的角度進行市場的分析和架構；但真正以經濟全球視野為思想中心的經濟經略當屬他的“萬國公共商場”主張。鄭觀應除了主張類似中外合資性質的“華洋合辦”等之外，還提出“打開門戶”在邊界創辦“萬國公共商場”。他認為該設想能夠帶來較多的經濟、政治利益：首先是能帶動經濟的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為民眾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外雙方可共利；

^①袁國客：〈張之洞治理海南黎族述評〉，《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銀川），第1期（2003）。

^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7。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1。

其次是能防止“侵佔”、“蠶食鯨吞”，進而“藉彼合力以保疆土”或“共同保護”。^①而海南便是他認為適合建設“萬國公共商場”的地區之一。

海南地理位置獨特，廣闊的海域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也潛藏着各國勢力的威脅，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人經商的積極性。由此鄭觀應意識到，僅僅用軍事力量固守海南很難抵擋各國勢力的覬覦，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主動將各國的利益與海南建立起聯繫，那麼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避免與其他勢力產生不必要的矛盾糾紛，海南也能避免步台灣後塵。

鄭觀應的海南經濟經略不囿於傳統固守思想，提出招商引資新模式便是其創新點之一。我國的商業經濟的發展並不成熟，中國商人出於安全考慮不敢前往海南投資經商，所以海南經濟活力的激發勢必要另闢捷徑。對此，鄭觀應提出“准中外人租地開礦、耕植畜牧，以期公同保護”，^②可見外資成為了不二選擇。他認為借他國資金活躍海南經濟的同時，與他國簽定貿易協約能夠實現“以商衛海南”，即以利益捆綁模式作為海南的一道“護身符”。

海南“萬國商場”是實現其國際政治認同“空間轉向”重要舉措，海南經濟網絡已不囿於加強島陸聯繫，而是結合島嶼網絡打造新的經濟市場空間，在提高海南經濟地位的同時提升海南的國際政治地位價值。

針對海南貿易圈體系的打造，鄭觀應直言“盡開商場，仿照英新、三藩市”。這是同時期的學者所提出的相關經略均不能與之媲美的。而要想發展對外經濟，便利、完善的交通體系的建設既是前提也是保障。除了已提及的黎峒山川道路、借發展畜牧業提供牛馬運輸兩種方式外，鄭觀應也主張海南對內發展河運，對外發展航運。首先，鄭觀應認為在海南內部，河流較多，有發展河運的優勢條件，“按瓊圖大五指山與霸王嶺相隔大略不過四五十里，知大五指山附於感恩、昌化為最近也。府之東路則挖昌化樂安省直抵其源流處，既通幽密而達明夷，復由樂安之右逾嶺以至樂平，西禦活羅，南指抱蘊，以控馭崖州、陵水諸黎”，^③海南水系發達，河網密佈，交錯縱橫，開通建設的成本較低、困難程度較低；其次，鄭觀應認為“宜於各港口之中擇其可以築砌碼頭者，招集鉅賈，湊合股份，設造輪船往來瓊崖一帶，駛至海口，使貨物流通往來，亦不至多需時日，是以輪船利導比開十字路之艱辛其便捷為何如也”。^④港口建設是建構“河運—海運”一體化的關鍵，河海聯運可為“萬國公共商場”提供交通保障，提高市場貨物的輸送量，極大激發海南內外部市場潛力，增加招商引資的資本。

值得一提的是，海陸聯運交通體系的先進思想與現在海南自由港的建設設想有着較高相似度，如海南目前正致力打造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區域國際集裝箱樞紐港，不斷擴大港口

^①夏東元：〈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識〉，《社會科學》（上海），第11期（1992）。

^②[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7。

^③[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1。

^④[清]鄭觀應：〈上粵督張香濤制府並倪豹岑中丞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7。

的貨物輸送量，為海南的自由貿易提供便利的交通支撐。^①由此可見，鄭觀應提出的“打造萬國公共商場”觀念是其海南經略超前性、跨時代性的最佳體現。

而張之洞作為近代治黎的重要主導者，在對海南以及黎區的整體的經濟措施中，雖然他的經濟經略高度並不能與鄭觀應相比，但其中也有與鄭觀應提出相似的措施，並在一定程度將其予以實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張之洞在“撫黎”計劃中便具體指出了“移民墾田”、“招商伐木”、“助商開礦”三項主要經濟經略。在礦產資源和林木資源的開發上，鄭觀應、張之洞兩人的意見較為一致。張之洞也有“開商設墟，鼓勵商業貿易”的經濟規劃，但僅僅是立足海南內部、國內的市場，主要目的是在“平黎”後穩定黎區的社會環境，讓黎人均有所勞且有所得。而鄭觀應的貿易圈建設理念則是以一種世界市場的視野進行規劃和建設，他的意圖主要有三個：一是為海南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提高海南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將海南的利益與多方掛鉤，達到保衛海南免遭法國列強進犯的目標；二是為黎人提供更多的經濟收入，以此促進海南黎區的穩定，也有利於後續海南發展建設工作的展開；三是讓海南具備獨立的經濟來源，為軍事海防、公路建設、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以此減輕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並提高“治黎”經略的可行性。

（三）鄭張海南經濟經略小結

從階級地位代表的差別角度來看，張之洞、馮子材代表着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受限於小農經濟思想，在海南的經濟規劃中有明顯的思想局限性；而鄭觀應則是基於商戰思想、以商人的視角分析制定海南經濟開發的最優方案，將經濟對政治的促進作用充分應用於海南的國際市場開拓經略中。其中，新農產品的開發、礦產資源的開採經略以及貿易模式對當時海南經濟的發展具有很高的指導價值，而其畜牧業的發展經略的科學性、可行性則比較低。但都能反映出其超前的經濟發展理念以及一體化、多元化的思維方式。

四、鄭觀應與張之洞的海南經略異同

總的來說，對海南軍事、人文、經濟的發展，鄭觀應提出的經略思想與張之洞、馮子材的思想措施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在具體的經略舉措中存在着差異性。雙方的海南經略根本性的差異在於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進而表現於經略根本出發點不同，鄭觀應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家，他的經略思想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意識；而張之洞、馮子材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洋務派，他們的思想、措施則是圍繞着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展開。

（一）兩者的相同之處

（1）地緣政治觀和軍事建設體系的革新

在張之洞的海南經略中，海南海防的現代化建設和治黎經略有着極大的思想指導價

^①〈重點項目馬力全開，自貿港建設動能足〉，《海南日報》（海口），2021年1月9日，版1。

值。而在近代海防建設的思想熱潮中，張之洞對海南海防的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他提出的一系列海南海防建設措施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海南海防的現代化建設。即使鄭觀應和張之洞所代表的階級並不相同，但是經略中也有許多跨階級的共識。立足近代國情綜合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進犯日益“囂張”以及近代中國國力弱的現實。其次，西方先進思想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和本土化的初步發展。再者，地主階級洋務派和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謀求近代中國發展的目標一致性。基於此，鄭觀應和張之洞提出的海南海防經略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了近代軍事建設的思維和手段。

鄭觀應將海南納入了南洋海防的重要關口，明確指出“凡海口生重地，莫不森列炮台，嚴為防範……築台必照西式之堅，制炮比如西法之精”^①；而張之洞修築了具有較強禦敵實力的海口秀英山炮台和大英山，炮台炮堤相結合，以近代軍事技術的手段有效加強了海南海防。而軍隊訓練也打破了傳統模式，不管是鄭觀應的民兵組建還是張之洞的綠營兵訓練、地方武裝組建，在武器使用、戰術訓練上都以西方模式作為參照。除了炮台築造、軍隊訓練外，有線電報網絡的打造也是兩人經略中近代海防思想的“亮點”。他們充分認識到電報在戰爭體系中的地位，對打造有保密性、便捷性、系統性的情報體系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可見兩人的戰爭防禦思想已打破傳統囿於提升武器和軍隊實力的局限，並將防禦體系提升到資訊情報層面。這一系列的海防軍事措施都極大程度上推動了海南軍事近代化的進程。

(2) 安內舉措的多元性

對內的相關經略主要體現在“治黎”和“撫黎”兩個方面。在“治黎”的問題上，鄭觀應和張之洞都清楚意識到匪患問題對海南安全的威脅，也明晰清政府對海南的內憂是鞭長莫及的。在統治集權無精力平定海南匪患的前提下，從實際出發，在海南當地發展武裝力量是必然的選擇；而從唯物史觀來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解決海南內部危機必要力量。有鑑於此，兩人都提出在海南建立當地的武裝力量，這也是思想進步的體現。

在黎漢矛盾問題上，鄭觀應和張之洞均採取了多元化的舉措，多維度尋找兩族的利益契合點，以期緩解相關矛盾。在海南修路造港、發展海南的資本主義經濟、鼓勵黎漢通婚、發展黎區教育等幾個方面上，都形成了大同小異的計劃方案。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海南內部的發展：第一，打破了黎漢兩族對立的僵局，讓黎族走出固步自封的生活環境，能夠為團結海南內部有生力量奠定一個良好的開端；第二，黎人的思想得到多方面的開化，更能接納黎區外部因素的介入，減輕海南內部發展阻力；第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啟動黎區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的流動，為海南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①夏東元：《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280。

(3) 產業資源和市場的開發協同性

海南豐富的資源得到越來越多方勢力的關注，但資金缺乏、技術落後兩個主要因素使海南沒法自行開發資源。對此，鄭觀應和張之洞都提出了“招商引資”，即借助外部的資金、技術對海南進行開發。鄭觀應在考察海南後，向張之洞呈遞的〈擬撫瓊黎暨開通黎峒山川道路節略〉以及向王之春提出的〈開墾兼承辦銅綠礦山書〉對海南的資源開發進行系統的闡述。在之後，張之洞也確實按照鄭觀應的設想，派馮子材、楊玉書入瓊平定客黎叛亂，設立善後機構，開通道路，組織招商引資開發資源。^①當然，除了礦產資源，鄭觀應和張之洞對海南的農業資源、林業資源、勞動力資源都有較為明確的認識。

開發資源是海南發展重輕工業的首要之舉，既能借此為重構海南經濟體系，又能為黎漢的“破冰”提供一定的經濟條件和保障，更是為海南商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原始動力和資本。

(二) 兩者存在的差異

由於鄭觀應與統治階級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並不一致，即使鄭觀應思想具有時代超前性，但在地主階級仍佔統治地位的背景下，他的海南經略並沒有得到全面施行。甚至，張之洞讀過〈條陳時務五策〉後，覺得鄭觀應的思想離經叛道，有“全盤西化”傾向，不宜重用。^②

(1) 民本意識的體現程度不同

鄭觀應和張之洞的階級性差異決定了各自對民本意識的應用和認可程度。在海南軍隊力量的儲備問題上，兩人都有意識到海南地方武裝的重要作用。鄭觀應融合了自己民團思想，他意識到“蓋泰西各國，寓兵於士、農、工、商”，所以明確指出“處處團防，村村聯絡，聲勢相應，休戚相關，而國無籌餉之艱，兵無遠調之苦”。^③他有全民皆兵、寓兵於民的意識，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所以他認為要給予黎民有充分的自主權。這無疑與張之洞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初心背道而馳。反之，張之洞為加強中央政府對黎區進行有效的軍政控制體系，採取了扣押黎族頭目親屬的方式防止暴亂，同時不斷削弱其權力。不可否認的是，該措施對黎族有很強的管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海南大規模新內亂的潛在危機。但從中我們也可看出，鄭觀應在於團結海南已有力量，充分意識到“一致攘外”的重要性，也充分尊重民眾力量；而張之洞並沒有清楚意識到清末政府的行政體系已經不能為該管理模式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仍以穩定中央集權為首要任務，以“安內”為最終目的，只為鞏固統治階級的勢力，也未能認知民眾創造歷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①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年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②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年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③[清]鄭觀應：〈民團〉，夏東元編：《鄭觀應集·救時揭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25。

(2) “治黎”、“撫黎”側重點不同

在“治黎”問題上，鄭觀應認為應當優先以懷柔手段帶動黎人發展，以溫和的手段讓黎漢矛盾在經濟發展中得到過渡和解決。當然，在面對匪患作亂的情況下，鄭觀應也不反對用強而有力的鎮壓手段。而張之洞則是提出了“大舉激辦”，最後取得的“成果”是黎族民眾懼於清軍軍威，紛紛被迫就撫。但在“大舉激辦”過程中，清軍對參加反抗的黎漢民眾進行了血腥的殺戮，使黎民的生命、財產受到空前的劫難，黎區的社會混亂狀態也只是在武力鎮壓下暫時結束。^①在“禦外侮”與“平內亂”的衡量上，鄭觀應更側重於以最小的矛盾激發點緩和海南黎區各階級、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尋求利益共同點，進而團結一切力量抵禦法軍的進犯。所以，鄭觀應的海南發展經略主要立足“保衛海南”的目的。

可見，鄭觀應“治黎”和“撫黎”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海南的綜合實力，緩和黎漢兩族的矛盾，穩定海南內部環境，進而能夠抵抗法國的進犯；而張之洞所施行的“治黎”和“撫黎”一系列措施，其根本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正是因為階級利益的差異，鄭觀應的“治黎”和“撫黎”措施越顯民主色彩。

(3) 區域發展的思想格局不同

為了保障海南的資源得到更多資本家的支持，加強海南各因素的聯動發展，鄭觀應着重考量了產業鏈一體化、交通體系一體化的協調發展，以及市場區域化思維的應用。這映射出鄭觀應海南經略中的相互依賴思維。

鄭觀應主張中有許多一體化思維的本土化應用，如“甘蔗種植—蔗糖生產”產供銷一體化產業鏈、機械化開採林礦資源、農牧產品市場的區域一體化的綜合考量等。除了經濟上的一體化，鄭觀應提出“河運—海運”的發展也充分體現了交通體系一體化。當然，在海南交通設施的建設上，張之洞還是有“開通十字路”、“環島鐵路”、“榆林港”的成績，這為海南近代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見，在一體化思維的應用上，雖然張之洞在交通體系的建構上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鄭觀應卻比張之洞應用得更為深入。

張之洞也有一定的區域發展一體化的觀念，但在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主導下，他的區域發展觀必然是不能達到跨國層次的。他的海南經略仍以傳統地緣政治觀為主導，並沒有打開海洋格局。相較於張之洞的市場觀，鄭觀應對於海南島在海洋格局中有更高水平的認識，能夠理清海南國際政治地位與其經濟空間格局之間的關係。儘管從階級上來說，由於打造貿易圈主力軍是資產階級，動搖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該設想並不現實；但以新時代的視角去看，結合現今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理念，鄭觀應“萬國商場”主張的先進性則是不言而喻的。

^①肖紅松：〈張之洞治黎方策和績效論析〉，《歷史教學》（天津），第7期（2005）。

誠然，鄭觀應的海南經略中存在如過於寄希望於外援力量、經濟規劃顧及統治階級利益等思想短板。正如易惠莉教授所言：“他越追求政治上的合法化，他的變革思想也就越失去尖銳性。”^①這主要是因為鄭觀應個人所代表階級的複雜性。在1880年前後幾年期間，鄭觀應既是外國洋行的買辦，又是民族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並兼任洋務企業的重要職務。^②可見，多重身份的交織重疊讓鄭觀應的部分思想依然有所受限。但總體看來，鄭觀應的海南經略的科學性、可行性、超前性仍佔思想的主導特徵。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黃耀岷 葛家傑]

^①陳曉平：〈張之洞與鄭觀應的相遇與乖離〉，《澎湃》，2021年2月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910436。

^②夏東元：〈論鄭觀應的一身四任——再論鄭觀應〉，《學術月刊》（上海），1979年第8期（1979），頁49—55。